

醜陋的殖民地

電信局的一幕鬧劇

趕回旅館，寫了一封信，向陸如贇道謝，並報告以珩已到舅媽處，舅媽留她住在她家，一切詳情，以珩自會給他去信，請他不必掛念，末後又勸他早日結束業務到香港來。我不敢說請他去臺灣的話，恐此信落入人手，惹出不必要的麻煩？況我自己的能否去臺灣，也還沒有把握，又怎能說這些肯定的話呢？寫完了信，又亟亟擬了一通電稿，拍給真兒，告訴他：「我已安抵香港，要他快速替我辦妥入境證寄來。」下面寫明了我在香港的旅館地址以及房間號數，因我一到香港，就用真名向旅館登記。共匪決不敢將魔手伸到香港來，我看得很清楚，況且我要和臺灣取得聯絡，是不能不用真名真姓的。

陸以珩沒有登記，她是一定會住到舅媽家去的，就不必多此一番進出的手續了。

於是我去到電信局，香港那時的電與郵是在一處辦公的。等我拍好電報也寄了信以後，正想出門，忽被一件使人心血沸騰的怪事，止住了我的脚步；祇見一個穿草綠色衣褲的中國軍人（被繳去武裝的軍人）被一些人團團圍住。衆口紛紜，指稱他是想來偷錢的，聲勢洶洶。那中國軍人分辯道：「我是來交信的（四川話寄信爲交信），怎麼說我是小偷？」

坐在櫃台後面的一個職員譏笑道：

「這地方是沒有錢可找的，你來找錢，找錯地方了。」說着便警告他的同事們道：「小心你的錢包。」全局的顧客聽了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則愕然四顧，不知是怎麼回事。內中有個中年的外省人代爲分辯道：

「這位老總說的是『寄信』，不是『找錢』，請你們不要誤會。」

「噢！你也是他的同黨，打！打！……」

這時候，我也忍無可忍了，便回轉身來，用英語告訴櫃台中那個職員：

「四川口音說『交信』，並不是『找錢』，無故誣良爲盜，是大英法律所不許的，請你們注意！」

噢！真奇怪，不但櫃台後那人立刻對我肅然起敬，連一些顧客們也變得鴉雀無聲了。祇聽見有人也用英語回話：

「謝謝夫人！我們錯了，請夫人包涵。」於是喝退衆人，用蹩腳的國語對那軍人說：

「對不住！請你原諒，你回去吧。」

我目覩此人走遠，才離開電信局，我心中十分痛念，我們的軍人在這殖民地受人侮辱。我不知道和不及爲他們辯解的正不知還有多少？因我往來香港，已不只一次，深知香港的大部份居民奴性已深，必須說他們主子的語言，才能夠使他們尊敬。誰知我剛出電信局的大門，但見馬路上人山人海，說是一「總督出巡」，因此老百姓都來看熱鬧。不久，幾個英國士兵，手執皮鞭，忽左忽右抽打兩旁的百姓。百姓們紛紛後

退。於是一輛輛汽車徐徐開過去了。最令人詫異的是被抽打的老百姓連呼痛都不敢，而且縱然挨了打也仍然要看。也許這些人從小就從皮鞭下長大起來，他們的自尊心早已不復存在，他們的神經也早已麻木了？想到在第二次大戰時，英政府封鎖我滇緬路的那種助紂爲虐的罪行，以及在日人攻佔香港時的那種狼狽投降的醜相。看見自己當年的同盟國——中華民國，偶遭挫折，就如此恩將仇報！落井下石！也不想，所謂大英帝國，早已是祇剩得「夕陽無限好，可奈近黃昏」的光景了，還要如此作威作福？……

愛國健兒流落他鄉

我一路想，一路走，走了不遠，又見一群穿草綠衣褲的中國軍人坐在路邊，那種淒涼無告的樣子，使我心中滴血。這批人大約是從四川轉戰到廣州，而被迫來此的中國健兒，如今不幸淪落到這步田地，內中還有眷屬，更是風塵滿面，憔悴不堪，總計坐在那裏的人數，不下五六十人之多，我身邊這點有限的幾十元港幣，無異杯水車薪，如其每人送一、二元，反而傷害了他們的尊嚴，於是我也用不太行的四川話



作者在香港電信局貴備洋奴們時所穿的就是這身衣服這付神氣。

（抗戰八年，我在重慶，多少也學了幾句四川腔）和他們攀談，知道他們要到海南島去和共匪作戰，如今生活和住處，都還不成問題。我又給他們打打氣，慰問一番。內中有個人站起來道：「小姐，你也是中國人嗎？我還以為你是外國人呢？你方才爲什麼要同他們說外國話？」

原來此君就是在電信局被圍困的那人。我笑道：「你不知道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嗎？我方才如其不用英語教訓他們幾句！……」

那人接口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不但我會挨揍，祇怕連你也要挨罵呢！」

「這就是殖民地。」

「這就是奴隸性。」

衆人你言我語，大家的氣，彷彿平下去了不少。我知道他們要到旁的地方去，便說了：

「大陸上見！光復大陸後再見！」但心上的淒涼，却並沒有減少，大有「白衣冠江上送」的情狀。

我懷着一顆沉重的心，向旅館方面走。隨手向報攤上買了兩份報紙，翻開第一頁，上面赫然有「英國已經承認中共……」的一行大字。緊接着說是：「我國航空公司二十餘架飛機，一直被港府扣留在香港機場的，業已交與中共，飛到北平去了。」這一連串的壞消息，看得我已經頭昏腦脹了，心想還是回旅館去吧。誰知一進旅館，那茶房白着臉告訴我：

「你的東西都給別人搬去了！」

「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來搬去的？」

「一個女仔子，就是和你同來的那個。我不許她搬，她倒虎着眼睛叫喚道：這些東西本來是她的，不是你的。她還留了一封信給你，在房間裏。」

於是茶房開門，進入裏邊一看，我的兩件行李，好好的放在那裏，看了信，知道舅媽叫她來把東西搬去，就住在她家了。好心的陸以珩，還留了一袋麵包給我，她知道我胃弱，隨時都會餓的。我笑道：

「她是我的親戚，搬的是她的東西，不是我的。」

茶房聽說，也就釋然了。可是經過了這半天的折騰，我的肚子倒餓了，旅館的硬飯我吃不來，便出去找了一家茶樓，叫了一盤我所最喜歡吃的：「炒齋河」（意即素炒沙河米粉）。以前我在省府做事時，住在羅公館的那一段時期，我也常溜出去吃「炒齋河」的。（羅公館的飯很硬，我這太弱的胃不敢多吃，因此常覺飢餓。）廣東的羅漢齋本是素菜。我因腸胃弱，一向不敢吃肉類，經常以蔬菜果腹。香港的茶樓，是帶賣點心的，一盤「炒齋河」，就夠我吃飽了。

吃完飯回旅館，洗過澡，我就睡了。香港天氣熱，祇穿毛線衫就可，那件海勃龍大衣，早已被冷擱在一邊，成了過時的裝飾品了。

靠攏靠攏被人玩弄

陸以珩信上明明寫着：上午要來看我，但竟然沒有來；人一入情網，就會忘記一切，除開她的戀人以外。這是常情，不足爲怪的。

我獨坐無聊，不免到外邊走走，想去買本書來看看，以便消磨時間。

也許我路徑不熟之故，我自「甘諾道」轉到「皇后大道」，竟不見一家書店、報攤倒有，但除開替共匪吶喊的幾家報紙外，其餘都是黃得不堪入目的下流書刊。好不容易，買到了一份比較正派的日報，正想回旅館去，忽然遇見一個熟人，他喊出了我的姓氏，高興地問：

「褚秘書，你幾時來香港的？我請你喝茶，就便談談別後。」

我抬頭一看，正是往日××部的同仁曾××。他是總務廳副廳長莊明遠的得力助手，一向相處不太壞，但我無意同他上去茶樓。他說：

「那麼就在這路邊談談也好。」他斟酌了一回，坦然地告訴我：

「我馬上要到北平去了，最好你也去，我們多幾個人熱鬧些。」

我冷然一笑道：「你原來已成了紅朝的新貴，真是失敬之至，至於我，我是寧死也不會去靠攏的。」他的臉紅了一下，解釋道：「我也是出於無奈，一家八口，拖到香港來，如何生活，去那邊，飯總還是有的吃的。」

我心想，祇怕連「吃飯傢伙」都要搬場，（意指被殺）也是未可知的。看在過去老同事的份上，我還

是勸他不要到北平去。我說：

「他們是要追查過去的，叫做『清查成份』，你是曾經做過××部的職員的，萬一落個『交代不明白』的罪名那就划不來了。還望你再考慮考慮的好。」

「我已是在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了。」他陰暗地回答，於是我們就分頭走了。

走不了幾步，又遇見一人，此人是個中醫。我會請他看過病。他請我去他的診所小坐。於是就滔滔不絕地談他的靠攏哲學，並力勸我和他一同靠攏，香港就有好幾處這樣的「統戰機構」，專一接待靠攏人物，免費送到北平去的。

我已忍無可忍，也顧不到一切了。我說：

「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強，你去做你的紅朝新貴，我做我的流亡人士好了。」說畢就走出了他的診所。其後又遇見了一位羅先生，是廣東省府的同事，彼此相見，甚為欣喜，我問他：

「你準備到那裏去？」因我和他處得很不錯，所以敢問這樣的話。

他蹙着眉頭道：「我想回去看看家中的老小。」

「這怕得考慮吧？你是當過一任縣長的。」

「我當縣長，不曾欺壓過老百姓，不曾貪過一文錢，我清清白白，想來他們也不至於把我怎麼樣的。」我再三苦勸他，不可回去，但他只是唯唯否否，不作明白的答復。

後來，我就不會再遇見他。直到我來臺灣後，聽說他回去一個星期，就被匪鎗殺了。

至於曾××的下場則無所聞。大約也好不到那裏去的吧？可憐這些人，對共匪還存有幻想，所以就吃了虧了。我自己呢？也並沒有什麼過人的才識，更談不到有先見之明，祇因我曾在江西隨軍進入贛南。（目前在臺的舊同僚，他們都在總部工作，所以不會到過前線。我是被羅卓英將軍調去十八軍軍部做事時，曾蒙參謀長施伯衡將軍派人教我們打鎗（手鎗）和馬術，要我們預備上前線。我在文壇月刊（二〇五期）和（八千里路雲和月）上曾有詳細的說明，請讀者參閱。）深知共匪的殘酷，早已不能拿人性去衡量。但是曾、羅諸人，並未參加過江西剿匪，所以他們不知道。如今白白送了性命，豈不可嘆！

香港地方小，每一次上街，總會遇見熟人，但總不能枯坐旅館，跬步不出大門，例如進餐或購買應用的物物等等，都非出門不可的。

一天，我正走着，忽遇某太太，她是上海人，夫家則為廣東人。在廣州淪陷以前，她們夫婦携帶子女，就逃到香港來。我們的言語相同，感情很好。她一把拉住我問長問短。她問我想到那裏去？我因和她交情很深，所以實告她：

「我要到臺灣去。」

她大為驚訝說：「臺灣很危險，你去做什麼？許多人都已逃到美國或是歐洲，至不濟也要在香港待一陣，總比去臺灣好，我勸你千萬不要到臺灣去！」

「我是一定要去的！」我說。

「你太固執了。」她嘆口氣道：「你就住在香港寫文章也可以過日子的。你趕去送死，人家也許還未必領你的情呢？我們至好，希望你暫時住到我家來，我先生有不少報館朋友，你一個月寫幾篇文章，生活就不成問題了，人是應該忠心，但太傻的事，却大可以不必做。」

第三天，又在路上遇見她，他又力勸我不到臺灣去。我也有點煩了，便一口回絕說：

「就是死，也要到臺灣去死！」

她嘆息道：「希望你不要後悔！」

從此以後，我就視上街爲畏途，一連好幾天，不到街上，買麵包也叫茶房代勞，自然「炒齋河」也久未入口了。

台灣力量使人震驚

真兒來了回電說：「已申請入境，一俟發下即行寄上，請母親勿念。」

我知道真兒並未遷移，心上便覺安慰不少。

恰好陸以珩來看我，我見她滿面春風的樣子，也覺替她高興。她很不好意思地低低告訴我「表哥向我求婚，我還沒有答應，要去信問問爹爹同意不同意，姨媽，我也想聽聽你的意見。」

我正色道：「這是終身大事，你看得鄭重是應該的，不過我究竟不是你真的尊長，我無權表示可以或不可以，站在朋友的立場，我的初步看法，你表哥人似乎很誠實，有錢，但沒有紳裨氣，真是難得。他對你已經很了解，是嗎？」

陸以珩攙言道：「他除我以外，不曾交過另外的女朋友。」

「這就很不容易了，我想你爹爹也不會不贊成的吧？」

陸以珩從心底裏笑了。又說：「舅媽要我來請姨媽去她家便飯。」

我推說胃不舒服，不想吃油葷，反倒請陸以珩陪我去吃羅漢齋。進入一座規模很大的酒樓以後，我就點了紅燒白鵝，燴魚翅。又問陸以珩想吃什麼？她吃驚道：

「姨媽爲什麼要這樣破費？」

「沒什麼，略表我的一點謝意，還望你不笑我寒酸才好。要不是全靠你們父女的力量，我怎能來到此地？自然這點小東道，又怎能表達我的心意於萬一，不過借機會談談倒是真的。」

「那麼姨媽救了我，我又該怎樣報答呢？」

「好吧！我們以後大家都不要再提這些了。」我笑着說。

這時紅燒白鵝已經上桌。我笑道：

看到這味菜，我倒有個故事說給你聽：

「記得是民國二十五年的秋天吧。陳辭公因公到了廣州，夫人也同來。我們幾個幕僚們，早已先到廣州待命了。」

「陳辭公那天很高興，便偕同夫人和幕僚們，一起到太平館去吃紅燒白鴿，這是他們的拿手菜，而且是遠近聞名的。時候是下午一點，夥計們正在忙着，却無人理睬我們這一批『貴客』。某副官大爲不滿，他因不會說廣東話，就用國語打了夥計們幾句官腔；意思是：『我們也是客人，你們爲什麼不表示歡迎？』這夥計不太懂國語，以爲這副官氣派太大，十分不高興，便用廣東話回報：

『白鴿是有的，我不（唔）做你的生意；不（唔）賣你的帳。』我們不能去和夥計爭吵，陳辭公祇有付之一笑，再到別家去了。」

「從此『不賣帳』一詞，便變成『術語』，流行直到現在（那時是三十八年）所以來到廣東，先要學會幾句廣東話，以免被人欺生。」

「這故事很有趣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。一個夥計，竟膽敢和一群貴客硬碰，這情形，除開廣東以外，別處恐怕不會發生的吧？」陸以珩若有所思地說：「爹爹一句廣東話也不會說，要他到香港來可怎麼辦呢？這也許是他情願守在上海，不肯離開的原因之一吧？」

「學就是了，我以前連一句廣東話（白話）也聽不懂，後來我用心學，現在，總算還可以對付。你爹人很聰明，祇要肯學，三個月就會學得很好了。」

「不！爹爹在語言方面不行，一口太倉話，總是改不過來。」
「慢慢勸他就是。」

「姨媽！舅媽要我和表哥訂婚後，一同到美國去，他讀博士，我進大學。」陸以珩又提起她的婚姻問題，還是免不了羞人答答的。

「那太好了，你要爹爹一同到美國去，你爹爹想必可以同意？」

「我回去就寫信。」

「祝你好運，代我問候並謝謝你舅媽和表哥。」

於是兩人說了再見，就各自分別走了。但我一顆心，早已飛到臺灣，路過輪船公司，就打聽去臺灣除開入境證外，還有什麼手續要辦。

那個胖胖的負責人說：

「要種牛痘，打防疫針，再加上入境證，就可以買票了。上個月我們帶了一個沒有入境證的客人前去，不但人不許上岸，船公司還要罰五百港幣咧！因此我們再也不敢帶沒有入境證的人去臺灣了。」

這時候，另一職員揶揄說：「他們還要捉船，用飛機發無線電給船長說：『你這船上有匪諜，跟我到臺灣去，不聽話，我就炸沉你們的船。』於是我們的船祇好跟着飛機到臺灣去，抓住了兩個匪諜，我們這條船也被扣在碼頭上，過了一個月才放我們離開，一個月不能做生意，你想倒霉不倒霉！」

我嘴上敷衍，心中却在笑；臺灣的力量，已經使人害怕，我真是太高興了。共匪不敢在白天開火車，輪船怕罰。好！好！

於是高高興興地進入房間。

次日，就去種牛痘，打防疫針，選把證明書放好。現在萬事齊備，祇等入境證一到，就可以成行了。

錦繡江山何年重見

等着等着，過一天有如一年。入境證還沒有來，陸以珩倒來了。她欣喜無限地告訴我：

「爹爹來信，已經答應了。舅媽要挑個好日子，替我和表哥訂婚。她說：『你爹爹不能來主持，請你姑媽代替你的家長也一樣。』姨媽，不，姑媽你肯答應嗎？要不然，我連個娘家人也沒有，這算什麼呢？」

「陸以珩向我撒嬌，已不再像從前那樣地醜觀了。」

「這是好事，我自然會去的，祇是我的入境證不知那天來，這是有時間性的，過時就會作廢。如其入境證來得遲，我一定去觀禮，並向你們道喜，否則，也許祇好缺席了，但我會寫一篇祝詞，叫人朗誦一遍，也是一樣，且看事做事吧。」

陸以珩高高興興地去了。

我一人躺在牀上，一些亂愁瑣恨，又不覺襲上心來；我，一個未亡人，又屢遭命運的播弄，去參加別

人的訂婚是否合適，尙是問題，而況又會因此引起自身的許多感慨，於人於己，都不太好，可以說我是早已打定主意不去參加的。於是就動手來寫祝詞，是一首語體詩，無非祝頌之意。寫畢又去街上買了一幅紅綢，用毛筆臚正，放着備用。

又過了幾天，臺灣的入境證還沒有來。

我怕真兒力量不夠，又拍了一封電報給以前在羅卓英將軍幕下同事的唐國民先生（字世聞，那時住在臺北市信義路一段十號，替羅將軍辦事。羅將軍家住屏東，來臺北時則住信義路。唐先生今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組長）請他爲我申請入境證。

兩天後，我從街上回來，帳房說有我的掛號信，一看是真兒的筆迹，信厚厚的，我拿着信三腳兩步進入房間，拆開一看，果然是准許入境的一紙公文，並有真兒信說：「望母親即日來臺，過時就會失放了。」我就像化子拾到了黃金一般，那種快樂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。我恨不得對全世界的人宣佈：「我已脫離魔窟，即將進入自由天地了！」大概由於太高興的緣故，除開復電真兒，說明我決定次日即乘北京輪來臺北外，（香港與臺灣一直有船來往，直至前二年，英方因爲媚匪，才停止了港臺間的海上交通。）竟然也給老同事（十八軍同事，又是政事部的同工）毛慕由先生去了一封電報，而且還說明了船期，那時的我，快樂得幾乎有點失却常態了。

於是買了紅封套，裝上祝詞，逕去堅尼道沈家道喜和辭行。和陸以珩握手道別以後，我就去買了些在

臺灣當時還是很稀有的水果——幾籃蘋果和幾籃金山橙，巧克力糖等，預備去送上司和朋友們的。

第二天，巴不到天亮，我已結束停當。午前就叫茶房結帳，那好心的茶房警告我：

「香港報紙，千萬不可帶去，要受罰的。」

我乃仔細地看過，決不帶一頁報紙。包東西都用牛皮紙，好不容易，我上了船了。（我不願陸以珩來送，所以沒告訴她船期。）

這次，我是堂堂正正的旅客，又恢復了我喜歡在甲板上走來走去的老習慣，房艙是放東西的地方，在我看來，逛甲板才是正當航海的方式，況且我如今心無罣礙，更不必焦急，因我已沐浴在自由的光影之中，船上執事，敬畏臺灣如神明，我——說：「到臺灣去。」彷彿自己的身形，也陡然高大十倍，而且神氣非凡了。

但同船竟無一個熟人，那些熟人，都被香港粉紅色潮流吞沒了，寧不令人嘆息。也許是我的交遊太少，也或者他（她）們都在艙裏休息，那像我這個野人如此地不安於「艙」，寧願在甲板上與浪花嬉戲，而不知道厭倦的呢！

遠望有隱隱的一條黑線，是大陸的邊緣吧？別矣！我們的錦繡江山，要等光復大陸以後再見了。我的父母之邦，我的姊妹們……正如「桃花扇」上所說的：「亂離當此別，再見是何年？」

海程很快，我遐想未終，說是臺灣已經到了。

遠望一帶峯巒重疊。人們說：「這就是基隆（原名鷄籠，以其形似鷄籠故名）誦先君詩有

「海天孤島困雞籠，一領征袍戰血紅，

鉅鹿呼援援不至，沉舟偏在浙江東。」

是弔劉永福率師抗日，不幸失敗的故事。（清廷昏庸，因與日本戰不利，竟將臺灣割與日本，以求達成和議。西太后所說的：「寧送朋友，不給家奴。」這事不過一個小小的例子罷了。）

船停妥後，還要經過驗關、檢疫等等手續，才許旅客魚貫上岸。

其實這蓬萊仙島，我已是二度登臨了。第一次是民國三十六年冬天，我從上海乘中興輪，到臺灣來探望真兒。在我記憶中的基隆港建築，如今似乎已有了不少的改進，尤其是到處是新起的雄偉的建築物，這一點，已足證明政府遷臺後，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中，還能夠注意建設，為民生謀福利的苦心。在我這一瞥的印象中，已激起了更深的奮發之情，和復國的信念。

我抬頭一望：瞥見欄杆邊，擠滿了接船的人群。忽聽有人大叫：

「媽媽！」

這聲音發自一位戴呢帽，穿公務員制服的男人的口中。面目焦黃。我幾乎不認得他是誰了。過細再看，才知他就是我的獨子真兒，兩年不見，怎會老得如此？簡直像個中年人，那像是二十五歲的健壯青年？

真兒又說：「毛伯伯和毛伯母都來了，哪！那不是毛伯伯嗎？」

我順着真兒所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看見毛慕由先生正在那裏東張西望呢。

此時，我已走上了碼頭，在人叢中緊跟着替我拿行李的腳伕。我要真兒代我照顧行李，自己則去招呼朋友。我說：

「毛先生，真感謝，又真抱歉，累你從臺北到此地來接我。我也太胡鬧了，無端發電告訴我的船期。」說話間，一位太太走過來叫我：

「褚秘書，辛苦了。」

我望着那位胖太太，微微楞了一下，才想起來，趕忙回答：「毛太太，對不住，對不住。我們去那邊休息一下吧。」

毛先生阻住我的邀請，他說：「我還要接另一位朋友，說好了我來接他，但還沒有找到他，人太多，找朋友真不容易。」

於是我對真兒說：「那麼我們先回臺北吧。」

「那不行，請你們在那邊再等一下，我們一同回去，此地的黃包車太高，車伕走路又慢，基隆到臺北有火車，却沒有出租汽車，還是坐我的吉普車去吧。」

等了好久，毛先生的朋友沒有來，碼頭上人已走盡，大約他要等下一班船再來了。

「我們走吧。」毛先生教我們上他的車，他很細心，還帶了拖車，但我行李蕭條，一部吉普車還裝不

滿，這拖車祇好空着跟在我們後邊，轆轤地轉動着，似乎在表示他的失望。

拖車雖然失望，但車中人的我，却像籠中初次飛出來的鳥兒一般，那一份快樂和欣幸的感情，不是筆墨所能夠形容它的萬一的。我已到達了自由中國的領域，就連呼吸一口空氣，也是自由和快樂的。我已由地獄中，升到了天堂來了。

毛家那時，記得是住在大理街三十號吧，是一座二層樓房。他家住樓上，樓下誰住，我沒有注意，也沒有注意的必要，因我心上的事太多了，那有工夫去管別人的閑事呢？

但真兒似乎和毛家很熟，穿房入戶地，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。

我母子一向無家可歸，真兒從小跟着我東奔西走。我們便成爲「處處無家處處家」了，在不知就裏的人，還真不明白這一雙孤兒寡母，何以不現一絲悽悽惶惶的可憐形相，而且到處是賓至如歸，很是自由和快樂的呢。因爲真兒跟着我接觸的人物多了，又兼常常在絕不相同的地區中生活，也就養成他樂群和能夠適應環境的性格；凡是我的長官，同仁，沒有不喜愛真兒的。他也和人善於相處，不論男女老少，一概都可以成爲好友。這是他的長處，我的飄泊生涯，對他總算還沒有留下壞影響，我也覺得非常安心可是過猶不及，他這兩年來的生活，也因此吃了大虧，此事我起初還不知道，也無暇與真兒細敘，因我有更重大的事需要去處理呢！

誰知毛先生要爲我洗塵，於是到處打電話，告訴老朋友們，我已安抵臺北的消息。

我則竭力阻止說：「我馬上要隨兒子到南部去，沒有時間在臺北耽擱，如其你們請了我，我勢必回請，大家都忙，勸他千萬不要勞師動衆，反而使我不安。說了好久，他才接受了我的請求，不再到處打電話了。」

他那時是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印刷廠的廠長，所以有電話，又有吉普車，在二十餘年前的臺灣，算是很體面也很不容易的了。

但我志不在此，我有一肚子的話，要向當道密陳呢。

第二天，我答應毛家回來吃中飯之約以後，便由真兒帶路，坐車到陳公館去。時候是上午九時，估量陳夫人吃過早點，我們去也許比較合適。果然，陳夫人那時還沒有訪客。我送上禮物以後，知道陳夫人很忙，我們不能久坐，於是教真兒去院中散步，遂將我在陷區中所見所聞，以及一些相當重要的消息，詳細告訴了陳夫人，請夫人即日密告辭公，謀取對策。夫人也覺情勢相當嚴重，憬然道：

「等他回來，我就告訴他，要他密呈最高當局設法對付。」

此時，人報郭太太來訪，我母子便告辭走出。回到毛家，吃過中飯，休息了一陣，又由真兒嚮導我到羅公館去。

唐國民先生一見，訝異道：

「怎麼這樣快？我前天寄的入境證，怎麼你昨天就來到臺灣了？」

「我沒有接到你的入境證，我是用真兒寄去的入境證去買船票的。」我用謝罪的口氣回答說：「累你爲我奔走弄入境證，請原諒我在香港度日如年的心境。生怕真兒辦不好，所以又寫信託你辦，實在對不住！但計算日子，你比真兒快多了，早知如此，一逕拜託你，不是更好嗎？但不知這入境證會不會落入他人之手？」

「不會的，掛號信是會返回來的。」

因此我來臺灣，竟有雙份入境證，而且十分快速，聽說有人等上幾個月還拿不到呢！（後來才聽王超凡將軍說：警總對我的言行都有紀錄，所以一經申請，就立刻批准了。」

羅將軍方從屏東來，見了我也非常高興，說：

「你帶這許多贖菓送我，我要帶回屏東去呢？臺灣是沒有這種水菓的。」

其時羅將軍祇是一名國大代表，和陽明山黨政人員訓練班的副主任委員罷了。（主任委員是陳辭公兼，辭公以副總統兼行政院長，實在忙不過來，才奉准由羅將軍任副主任委員的。）依照過去的情形，羅將軍已等於下野了。許多事，我自然不便和他談，他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。在羅公館吃了晚飯，就教真兒先回毛家，我則一人去見桂永清將軍。

求桂將軍助游擊隊

桂將軍和我，由誤解而瞭解，以至成爲事業上的同志，上文已有述及。他老家在江西貴谿，我在江西時，他在南京，當海軍總司令，我和他常有信件來往。但真兒却從未見過桂將軍，所以我未便和他同去。桂將軍正好在家。我不及寒暄，就說：「這兒談話是否方便？」

他明白我的意思，就請我進入書房，並吩咐副官道：「若不是預先約定的訪客，就說我不在家。」副官退出，我們也就分賓主坐下。我問：

「教育長對於貴谿一帶的地理形勢，想必很熟？從福建進去，處處可以切斷浙贛路的交通。如今共匪防務空虛，贛南閩西各處，千里空營，祇把兵車東移西調，嚇嚇老百姓罷了，如今他們海空軍尚未建立，沿海工事，也未修築，又怕我中央軍轟炸，火車一律在夜間來往，白天不敢行動。」我繼續說：「共匪虐待我同胞的慘狀，比之古代的黄巢，張獻忠更甚百倍，同胞們延頸舉踵，哀哀望救。從軍事情勢，和援救同胞兩方面講，我們都應該及早反攻，時機一失，再要找回就不太容易了。」

他聽我說畢，起初是泫然欲泣，但一轉而變爲非常念慨的表情。他握拳透爪，站起身來對我，做出了要講演的姿勢，接着是一聲嘆息，反而放低了聲音說：

「天禍中國，使戴先生死於非命，以至在接收的時候，人們自作主張，你言我語的把許多裝備和戰鬥力都很優良，也從未曾打過中央軍的吳化文等大批僞軍放棄，逼使他們投入共匪的陣營，如虎添翼。各省的忠貞而且立功甚偉的游擊隊，連一張獎狀都吝於發給，而把他們不理不睬，貶入冷宮。人們失望之餘，

自然對於戲亂，也就心灰意冷了。至於正規軍呢，無故被編入軍官總隊，等於變相的遣散，不知是誰出的主意？想起這些真教人痛憤！」

我知他意有所指，本想說幾句話向他辯解，但他早已說過不是一、二人的責任，我若一辯，反倒弄巧成拙了。於是用勸解的口氣說：

「當時因勝利來得太快，大家在心理上沒有絲毫準備，許多事的不能盡如人意，勢所難免。不過在久戰之餘，兵力疲乏，人思休息，而正當我國庫空虛的時候，友邦的忽然停止軍、經援助，這才是最大的原因吧！」

桂將軍是一位極富感情的人，他的喜怒哀樂，都很強烈。方才的激動過去後，他已漸漸平靜了，聽了我的話，也很以為然。他說：「不過就爲了友邦的落井下石，目前時機雖好，而武器與兵力都亟待補充，若說立刻反攻，真是談何容易。」

這次是輪到我點頭了。我就把話轉到目前如何接濟游擊隊的問題上來。

桂將軍一口答應道：「這是小事，我還可以辦到，你祇把目前的幾位負責人的姓名，和他們可能的活動地區寫給我，我可用空投或其他的方式給他們一些接濟。你不是說要武器、彈藥和金錢嗎？」

「是的」我說：「政府接濟他們的最大的作用，在鼓勵士氣，與振奮人心，讓他們知道，他們並不是被遺棄的孤兒，就足夠了，至於數量上自然不會太多，政府目前處境困難，他們也是知道的。」我說畢，

便從皮包中拿出紙筆來，開了幾個我所知道的游擊隊負責人的姓名，和畫了一張地區的草圖地點是在貴谿的深山中。

公事談罷，我就起身告退，桂將軍送我出來，問道：「你目前的生活怎樣？兩年不見，你憔悴多了。」他這滿含人情味的話，使我感動。我謝他的關心，祇說：「小兒在台糖供職，我明天就要隨他到南部去。這一路逃難，能活着到臺灣來已經很不容易了。健康上自然吃了大虧。我想休息休息，就會好起來的。」我請他代我問候太夫人和夫人。

於是出了桂家，又回毛公館來。

我對毛氏夫婦和真兒，都不提桂將軍，因為我和桂將軍在公事方面的合作，除開陳辭公以外，別人都不知道。「保密」是成功的因素之一，我在家人面前，也一向不提公事的。這是一個幹政治工作者起碼的常識，不能不予注意，但如今事過境遷，一切的人與事都已成爲歷史，說說也就無所謂了。